

國學新視野

方召麐

方召麐 作
「梅樹下」

大家訪談

國學名家：

鄭煒明：饒宗頤的國學新視野

漢學名家：

馬悅然：我的學術生涯

陳文芬：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專訪

王堯：藏傳佛教之活佛轉世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樂黛雲：漢學新動向的三個例子

吳宏一：《詩經·唐風》新釋

李焯芬：佛學新視野

劉再復／劉劍梅：關於《紅樓夢》的最新對話

野口滿成／方順生：方召麐的藝術與人生

嚴紹盪：近代日本中國學形成的歷史考察（上）

吳新雷：從「蘇崑」《牡丹亭》展望崑劇的傳承發展



開堪折直
次折莫詩
梨花空折
枝一九九七
日晨子南
山畫之
時年
六十三歲
每日工作七
小時習以
為常
方召麐

國學新視野

(春季號)

何志平 主編

瀋江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國學新視野. 春季號 / 何志平主編. — 桂林: 灕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07-5108-1

I. ①國… II. ①何… III. ①國學—研究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 028024 號

國學新視野. 春季號

總 策 劃 何志平

特邀主編 潘耀明

執行編輯 鍾宏志

責任編輯 吳 萱

出 版 人 李朝暉

出版發行 灕江出版社

社 址 廣西桂林市南環路22號

郵 編 541002

發行電話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傳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郵購熱線 0773-2583322

電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製 東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1/16

印 張 10

字 數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07-5108-1

定 價 42.00元

灕江版圖書: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灕江版圖書: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可隨時與工廠調換

編輯顧問

(按姓氏筆劃排列)

干春松 王 堯 戶川芳郎 朴宰雨 李焯芬
 李學勤 吳宏一 余英時 汪榮祖 金耀基
 秋 風 馬悅然 袁行霈 徐蘋芳 陳 來
 陳 明 傅佩榮 傅璇琮 馮其庸 湯一介
 裘錫圭 鄭吉雄 鄭欣淼 樂黛雲 劉再復
 劉笑敢 劉夢溪 韓 星 嚴紹盪 龐 樸
 饒宗頤

《國學新視野》編輯委員會

主 席：何志平 紀寶成

副主席：李俊杰 黃樸民 馮國培

委員：

路祥安 麥國華 潘耀明 梁 濤 張 雅
 戴 旭 莊建中 焦玉華 施月華 方友群
 鍾宏志

出版人：何志平

特邀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鍾宏志

特邀高級編輯：張世林 陳文芬

刊名題字：饒宗頤

篆刻設計：施元亮

裝幀設計：李尤颯 (Yousa Li)

主辦：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 中華（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協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目錄

Content

- 4 作者簡介 The Authors
- 5 創刊詞 From the Publisher
- 6 卷首語 Foreword
- 7 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大家訪談 Meeting Maestros

漢學名家 Sinology Scholars

- 10 (特稿) Feature Articles

馬悅然：我的學術生涯

My academic career—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 19 陳文芬：漢學生涯始於《道德經》——專訪馬悅然教授

Sinology study begins with Dao De J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G.D. Malmqvist—Chen Wenfen

國學名家 Chinese Culture Scholars

- 25 鄭煒明：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Jao Tsung-I's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Culture—Zheng Weiming

沉潛國學 Chinese Culture in Depth

- 35 王堯：藏傳佛教之活佛轉世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incarnation system of Tibetan Living Buddhas—Wang Yao

- 57 吳新雷：從「蘇崑」的青春版《牡丹亭》展望當今崑劇藝術的傳承與發展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Kun opera as demonstrated by the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Wu Xinlei

- 67 嚴紹璽：近代日本中國學形成的歷史考察（上）

The forma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a historic review (Part I)—Yan Shaodang

人物檔案 Profiles

- 64 繆元朗：繆鉞學術簡述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Miao Yue—Miao Yuanlang



國學新知 Chinese Culture Update

- 97 樂黛雲：漢學新動向的三個例子
Three examples of the new trend of sinology – Yue Daiyun
- 101 李焯芬：佛學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 on Buddhism – Lee Chack Fan
- 108 吳宏一：《詩經·唐風》新繹
Interpreting Tang Feng in The Book of Poetry – Wu Hung I

薈萃 Meeting Point



- 129 劉再復 劉劍梅：「紅樓」真俗二諦的互補結構
——關於《紅樓夢》的最新對話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the truth and falsehood in “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 recent dialogues – Liu Zaifu and Liu Jianmei
- 142 王培元：「四書」的由來
The origin of “The Four Books” – Wang Peiyuan

藝苑 Fine Arts Corner

- 144 野口滿成 方順生：對談：方召塵的藝術與人生
Dialogue: The art and life of Fang Zhaoling – Mitsunari Noguchi and Fang Shunsheng



國學網絡 Networking Chinese Culture

- 152 國學資訊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中間彩頁 Colour pages



- 77 方召塵書畫欣賞（文見藝苑）
The works of Fang Zhaoling (Article in Fine Arts Corner)
- 78 「不半」專欄 “Bu Ban”
歐初：「不半」老人雜憶
Mixed memories of elder “Bu Ban” – Ou Chu
- 80 「新山海經」專欄 “New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謝春彥：祖約阮孚 各有所好
The hobbies of Zu Yue and Ruan Fu – Xie Chunyan

作者簡介



湯一介



馬悅然



鄭煒明



陳文芬



王堯



吳新雷



樂黛雲



嚴紹盪



吳宏一



李焯芬



劉再復



劉劍梅



野口滿成



方順生



王培元



繆元朗

湯一介，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儒藏》編撰中心主任，儒學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理事。

馬悅然，瑞典，著名漢學家，先秦著作專家。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人文科學院院士，皇家科學院士。

鄭煒明，常用筆名葦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高級研究員。出版十餘種學術著作，在兩岸四地及其他國家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陳文芬，廣播書評人，主持台灣飛碟電台「陳文芬時間」，News 98「非聽Book」等節目。寫作誠品書店雜誌《作家書房》，印刻文學雜誌《作家原鄉》等專欄。

王堯，中央民族大學藏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著有《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藏學零墨》等。

吳新雷，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戲曲史家，崑曲史論家。著有《中國戲曲史論》、《兩宋文學史》、《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等。

樂黛雲，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兼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比較文學原理》等。

嚴紹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主席團主席。著有《中日古代文學關係史稿》、《日本中國學史》等。

吳宏一，曾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

李焯芬，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劉再復，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評論》主編。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研究員和香港城市大學榮譽教授。

劉劍梅，劉再復女兒。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曾出版過中文著作和英文專著，另有中英文文章發表於各種報刊。

歐初，著名收藏家，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社會科學院客座教授等。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廣州市委書記等職務。

謝春彥，畫家、美術評論家。上海中國畫院畫師。2002年被美國三藩市政府授予有特殊成就的藝術家稱號。

野口滿成，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前館長。

方順生，方召麐之子，聯合國即時傳譯部部長。

王培元，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著有《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後出圖文版《延安魯藝風雲錄》）、《在朝內大街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

繆元朗，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1982年1月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專業，學士。



創刊詞

《國學新視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版的。我們有幸延攬到一批海內外國學大師和碩學鴻儒擔任編輯顧問。打開名單，饒宗頤、湯一介、袁行霈、馮其庸、李學勤等諸位教授，還有諾貝爾文學獎評審、著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等，每個名字都讓人肅然起敬。尤為難得的是，他們不僅是顧問，也是惠賜稿件的作者。有了他們的支持，《國學新視野》就有了一流的質素、一流的文章。

《國學新視野》「新」在何處？首先，在內容上。國學貴在精神，中華文明為何能歷經五千年風雨而不衰？中華民族精神命脈何在？在「國學熱」方興未艾的今天，傳統文化的傳揚不能只流於表面的符號形態，而要保存其內有的靈魂，更要提煉出恒常不變的核心價值，並加以傳承、保育、發揚光大；其次，在方法上。歷史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我們要用現代化的語言、手法、話題以及載體來詮釋傳統，一句話，傳統要走向現代，尚古更要創新。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歷經五千年，到今天都能引以為用，就是因為它有着鮮活生命的時代文化的不斷添加。總是有新的因素加入其中，讓傳統富於活力和創造性。傳統中的這種力量也最終和中國人走向現代的趨勢是一致的。第三，我們要面對新一代的年青讀者。因為只有年青人才是古老傳統的生命力之源泉。中華民族一直以來都能生生不息、與時俱進，就是因為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延續傳統，五千年來從未間斷。《國學新視野》既有大家名作深度閱讀，也有國學之門深入淺出，就是要兼學術研究與普及弘揚於一身。

所以，正如《禮記·大學》裏所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就是本刊所追求的方向，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繼往開來，從傳統中開闢新的視野。

當今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文化「軟實力」崛起。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是文化體系與文化體系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西方的文化霸權面臨質疑與挑戰，而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卻歷久而彌新。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大國崛起，文化復興。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從事能源戰略和文化研究，旨在以能源外交和文化外交來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基金委員會放眼未來，策劃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刊物，開闢一個面向全世界華人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國學新視野》就是其中一份，它也是基金會打造的一個高端學術品牌。我們欲借此平台，廣泛凝聚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發展之炎黃子孫，傳遞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走向中華文化全面復興之路。

何志平
中華（出版）社出版人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



卷首語

中國和世界是必須「和合共生」的，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離不開全球的其他國家，其他國家也離不開中國，同樣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是一樣。「和合」這一概念是來自中國古老的經典《周易·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意思是說，天道（可以指宇宙萬物）是在不變的變化中，在世界中的各種事物都應有其適當的位置共同存在，保持着合作的太和（指完美的和諧狀態），這樣一切事物都可以順利發展。我想，這也正是「和合共生」的意思。當今，人類社會存在着種種複雜的、相互矛盾、不斷變化的狀況，這種狀況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終歸要找到他應當存在的位置、所應負的責任而共同存在，如何能達到這種狀態，就需要大家來共同保持合作的「太和」，這樣人類社會才可以合理地、理想地順利發展。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太和」的觀念多麼重要。中國的一位大哲學家王夫之說：「太和，和之至。」就是說：「太和」是人類社會的完滿和諧狀態。人類社會如果不想毀滅自己，就必須自覺追求「太和」的理想境界。達到這種完滿的人類所追求的「太和」的理想境界，是人類自古以來所期待的一種「理想世界」，在希臘有柏拉圖的「理想國」，在中國有孔子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在印度有佛教的「極樂世界」，在歐洲近代又出現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可見人類社會是一直在追求着「完滿的理想社會」。

——湯一介先生在第四屆中國學論壇發表的講話（摘要）



編者的話

國學，於二十世紀初興起，而盛行於二十年代，曾有一段時期沉寂，八十年代復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再次掀起「國學」熱，迄今方興未艾。這一趨勢，反映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當今，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重新釐定位置的時候。

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固有學術，寬泛一點講，中國傳統社會的學術與文化，包括醫學、戲劇、書畫、星相、術數等等，也可以視作國學的範圍。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並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在《民報》第七號所載《國學講習會序》中，他是這樣論及了「國學」的：「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並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了。

近來有學人傾向「國學」即「中國學」的說法。「中國學」（China Studies）、「漢學」（Sinology），原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社會與文化使用的概念，涉及歷史、政治、社會、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藝術、文物、經濟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這與時下大講的「國學」實不無若合節拍之處。雖說發行一刊，發凡起例，不能忽略正名的重要，但亦不妨「退一步，海闊天空」，以中國固有學術為本根，熔國學、中國學、漢學於一爐，中外一揆，容納百家，豈不皆大歡喜？！

隨着世界格局中的中國角色越來越重要，國外「漢學」和中國學研究，已經十分發達。歐美不用說了，單是韓國就有一百六十一家大學有中國學（漢學）。此外，《國學新視野》還想包括藏學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既把本國學者關於國學的研究成果介紹到國外，同時也樂於把國外的學術研究吸收進來，使之成為中外學者研究中國、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的共同園地，成為溝通中外學術文化的一座橋樑。

《國學新視野》期望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為當下的國學研究開一新生面。它屬於今天，屬於廣大讀者。它不是學報，不是高頭講章，力圖做到曲高和「眾」，盡可能為人們所喜見樂聞。這才是我們的旨意所在。

特邀主編
潘耀明



馬悅然：我盡可能地用真誠的方式

客觀評價的能力是一個學者所不能不具備的。我願無私且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作品，並且判斷他的著作

我是六十年前開始學中文的。這六十年內，漢學各領域發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但研究的目的沒有改變，研究的目的總是尋找真理。

——馬悅然

《國學新視野》

：大家訪談



來將我自己呈現給各位。

意談到我自己的學術生涯，我深信一個學者，是能夠全然
中甚麼是優秀的，甚麼是可以的，甚麼是微不足道的。

本期大家訪談主要內容：

（一）漢學名家

- 1. 獨家特稿：馬悅然：我的學術生涯
- 2. 專訪：漢學生涯始於《道德經》
——陳文芬專訪馬悅然教授

（二）國學名家

- 饒宗頤先生的國學新視野
——鄭煒明博士專訪饒宗頤教授



我的學術生涯

馬悅然

思量這個講題時我忽然警覺到我是屬於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所訓練出來的學術時代，而這個時代在漢學這個領域內快要消失了。我是六十年前開始學中文的。這六十年內，漢學各領域發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研究的目的沒有改變，研究的目的總是尋找真理。可是六十年前研究的條件和方法要比現代差得遠了。六十年前沒有影印機，也沒有多少引得和索引，沒有電腦、系統資料庫，更沒有像《中文大辭典》，《漢語大辭典》和著名日本學者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那麼大的辭典。

客觀評價的能力是一個學者所不能不具備的。我願意談到我自己的學術生涯，另一個原因是我深信一個學者，是能夠全然無私且客觀地看待自己的作品，並且判斷他的著作中甚麼是優秀的，甚麼是可以的，甚麼是微不足道的。

追隨高本漢



馬悅然著作《高本漢：一個學者的肖像》（此為2011最新出版英文版），中文簡體字版有《我的老師高本漢》，2009年出版。

1940年代中期，我在瑞典烏普撒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主修古典語文。當時我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的拉丁文和希臘文老師。我利用閒暇時間閱讀中國哲學的著作，特別是道家經典《道德經》和《莊子》的譯文。當我讀《道德經》英文、法文和德文三種譯本的時候，發現那三種譯本的區別非常大。到1946年春天，我鼓起勇氣給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打個電話問我是否能去拜訪他。他親切地答應了。幾天之後，我見到了他。我向他請教究竟哪一種《道德經》的譯本是最好的，他回答說：「那些譯本都一樣糟糕。只有一種《道德經》的譯本是好的，那就是我自己譯的。」於是他借給我他那時還沒有出版的譯本。一個星期之後，我把譯本還給高本漢時，他就問我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學中文。我當下就決定這麼做。同年秋天，我告別了烏普撒拉大學，到斯德哥爾摩去跟高本漢學中文。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跟高本漢教授上的頭一堂課。同學不多，一共只有六個人。高本漢給每一個學生分發一部《十三經注疏》的《左傳》文本。我那時只知道古漢語是一種單音節的語言，而且每一個單音節是由一個獨特記號標識。當高本漢念到文章的一個段落時，我就計算他念了多少音節，然後就在文本同樣數目的方塊字下畫個小記



號。不久之後，我就注意到，某些特定的字常常出現在我畫的記號前。慢慢地，高本漢對文本語法結構的解說、對字形分析，以及對文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闡述，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比任何古漢語教科書所能給我們的多得多。

對高本漢來說，中國歷史上的近代時期是從後漢開始的。他在講課當中所選的文本多半是先秦作品。偶爾他也會講授一些南北朝及唐宋時代的詩和文章。當我們詢問為甚麼不讓我們讀些更近代的文本，高本漢選擇晚明小說《好逑傳》。自然地，高本漢也教授我們，他在擬構中古與上古漢語所使用的方法。這使得我們學生對古代漢語音韻的理論能力，遠遠地超過我們對現代漢語口語的實際使用能力。1948年夏天，頭一次到中國的時候，我甚至連一句中國話都說不出來，然而我卻能比較輕易地閱讀經典作品。我也能決定我所認識的漢字屬於《詩經》的哪一個韻類。

當我們向高本漢請教如何在研究上有所進步時，他對我們所提出的忠告是：「讀書！讀書！再讀書！」我後來也把這個忠告提供給我自己的學生。要獲得對文本的「感悟」，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讀。在開始的時候，進度當然會很慢，而且你必需在辭典裏翻查許多字。但是不久之後，你就會抓到對文本的結構、韻律及風格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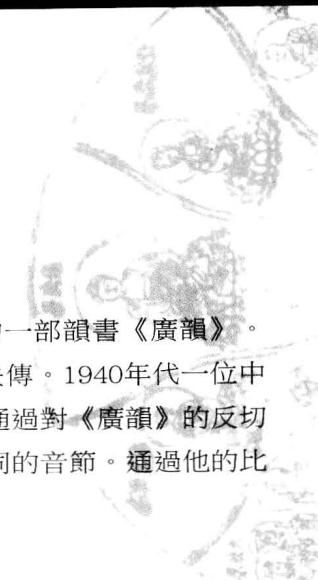
方言調查

1948年高本漢的五個學生，獲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到中國進行研究。高本漢決定要我到四川去調查方言。他自己，二十歲的時候，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曾經前往山西太原調查中國北方的很多方言。他那時沒有機會到四川，所以建議我到那兒去搞方言調查。

我從小喜歡語音學和方言學。十幾歲的時候，我家由瑞典中部搬到南方，一個靠海的小鎮。離那小鎮幾十里路有三個鄉村，兩個在北邊，一個在南邊。我早發現那三個鄉村的村民，講着同樣的方言；而與我住的那小鎮，所講的方言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常常騎自行車到那些鄉村去記錄方言。而我每一次回到我的故鄉，很高興發現「鄉音無改」。

我的老師高本漢，十幾歲的時候也記錄了他家鄉的方言。他的記錄發表在一個科學性的刊物上。

也許有人會問：「一個二十幾歲的瑞典人，為甚麼到中國去調查方言？」這個問題非常容易回答。要是高本漢在九十五年前沒有調查過中國方言，我們現在很可能不會知道中古和上古漢語的音系到底怎麼樣。高本漢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他所調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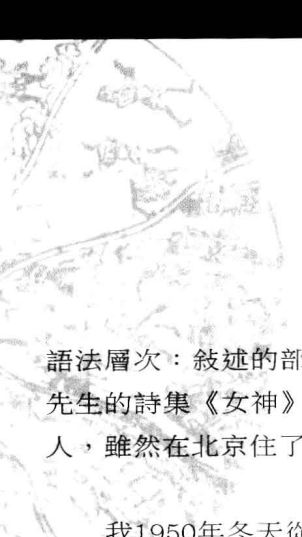
三十三種方言。他同時以所謂「反切」標音的方法，研究宋朝的一部韻書《廣韻》。《廣韻》的前身是發表於公元601年的《切韻》。《切韻》早已失傳。1940年代一位中國音韻學家在北京琉璃廠發現了一部完整《切韻》的唐朝寫本。通過對《廣韻》的反切的研究，高本漢發現中國隋末唐初的文人，在普通話裏有多少不同的音節。通過他的比較方言學，他擬構了中古漢語的發音。

我在四川兩年（1948到1950年），主要調查重慶、成都、樂山和峨嵋四種方言。我相信你們聽一個重慶人或者一個成都人講話，你完全聽得懂。可是樂山話和峨嵋話你們不一定聽得懂。那兩種方言的音系，跟以成都話為標準的四川普通話的音系大不同。主要的區別是重慶話和成都話有六個母音和四種聲調，而樂山話和峨嵋話有五個母音和五個聲調。那兩種方言保留原來的所謂入聲。我不願意詳細地給你們解釋這些方言的區別，我只想讓你們聽一聽樂山話怎麼樣。我頭一次到樂山的時候，聽一個媽媽在街上大聲找她的兒子：「ngoli dl dai ladi?」（我在這兒用拉丁字母寫一句樂山話。）「我的兒子在哪裏？」。

1949年，我在峨嵋山腳下的報國寺住了八個月。一天夜裏因為睡不着，到山門內的院子去抽根煙。我忽然發現一個我不認識的和尚從廟裏往山門走來。那人走近了，我發現不是和尚，是個尼姑！我猜她是離報國寺不遠的一座尼姑庵的尼姑，偷偷地到報國寺來跟她的愛人同一下床。那時報國寺有五十幾個和尚，只有方丈和當家睡自己的屋子。那尼姑肯定是報國寺當家的愛人。你該知道，報國寺的牆壁很薄，窗戶也用紙代玻璃，你在屋裏講的話，睡在隔壁的人都聽得很清楚。我忽然想，漢語是個利用聲調的語言。那你悄莫聲的說話，聲帶不振動，聲帶不振動，就不會有聲調的區別。你whisper的時候，有甚麼東西來代替聲調呢？我考慮了很久，才找着了這個問題的解釋。中國方言的聲調，有的是上升的，有的時下降的，有的是先下降而後上升的，有的是既不下降又不上升的，那就是平的。你說出一個音節時，所用的氣流，有的是漸次加強的（crescendo），有的是漸次減弱的（diminuendo），有的是先加弱而後加強的（diminuendo-crescendo），有的是既不加弱而又不加強的。這兩種表現是有相互關係的。上升調與加強的氣流，下降調與加弱的氣流是有相互關係的。所有有聲調的語言出現這個現象。我認為這個發現是a feather in my hat（一個比較重要的功績）。

我在方言學的另一個貢獻是：我不但研究過四川方言的語音系統，我也研究過四川普通話的語法。一般的研究方言的著作專門集中在語音系統方面。我研究四川方言的語法的著作可以算是個拓荒的工作。

對方言的知識也會幫助你更深入地欣賞文學作品。我相信你們都讀過巴金的小說《家》、《春》、《秋》。我也相信你們沒有發現作者在這三部曲裏利用兩種不同的



語法層次：敘述的部分用當時的普通話，可是在對話裏用的是成都方言。再說郭沫若先生的詩集《女神》：用普通話念，你就完全忽略原文的韻律和語調。郭沫若是樂山人，雖然在北京住了好幾十年，他還保留他故鄉的方言。

我1950年冬天從中國回來，先用我的四川方言資料考一個博士學位。以後在烏普撒拉大學講了一年的中文。1953到1955年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當了中文講師。我那時主要致力於一般語言學的研究，尤其是集中在美國結構主義的學派。

在1956至1958年間，我擔任北京的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秘書。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的時間沒有甚麼收穫。但是我那時有機會跟一些大陸的作家和文人見面。

《公羊傳》和《穀梁傳》的研究

1959年我獲聘為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的高級講師，兩年後升等為教授和中文系的系主任。我那時才有機會回到漢學研究工作。

自我1958年底離開北京一直到1979年春天，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歡迎的人物。理由之一是我發表了幾篇批評中共農業政策的文章，以及我的岳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年之後才獲得平反。在那二十二年間，我當然沒有機會搞田野調查工作。除了繼續整理我的方言資料，我也寫了幾篇關於上古漢語和漢代漢語音韻學的文章。

從我學中文開始，我對《左傳》特別感興趣。《左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另外兩傳是《公羊傳》與《穀梁傳》。其實，《左傳》與《春秋》原來沒有任何關係。《春秋》是記錄魯國從公元前722年到481年非常簡略而簡直沒有文學價值的歷史。《左傳》是一部文學價值很高的中國各國從公元前722年到468年的歷史。漢代，《左傳》排列成《春秋》傳。

古代的學者都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他們也認為孔子用很特殊的寫法來表示所謂褒貶（praise and blame）。《公羊傳》和《穀梁傳》皆致力於確認及解釋《春秋經》的作者用來表達褒貶的術語和書法。兩傳使用問答體的表達方式。兩傳也採取嚴格公式化的文風以及很特殊的語法。此外，這兩傳也運用特定詞語來表示高度專門的意義。這些文本的特徵使得它們非常容易被誤解。

今天很少學者會接受《春秋經》所提供的這套褒貶理論，但我們得記住漢代只有極少數的學者才不會相信這套學說。《公羊傳》和《穀梁傳》在漢代以來的知識生活

裏曾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對《公羊傳》與《穀梁傳》兩個學派之間的相互衝突的理論做徹底的認識無疑是理解漢代思想的必要條件。

我用好幾年的功夫把這兩傳的主要部分翻譯成英文，並且對這兩部書的特徵做了比較詳細的研究。

同一期間，我也研究《春秋繁露》，把整個文本加了比較詳細的註解翻成英文。按照傳統的看法，這部書是西漢學者董仲舒（前179-前104）所作。我對這部書的研究讓我相信文本的一小部分才是漢代的作品，主要部分可能是南北朝後期的偽作。值得注意的是編《春秋繁露》的人依據了東漢班固的《白虎通》和東漢何休的《公羊傳解詁》。《春秋繁露》中也有一些與時代不符之處。

對「嫌」字的解釋

《公羊傳》隱公一年，有這樣的記錄：「藤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美國漢學家George Kennedy（“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nqiu”）把這個記錄譯成英文：“The marquis of Teng died. Why is the personal name not given? Because the state was small. If it was a small state, why is he called Marquis? To avoid discrimination. The Chunqiu has no objection to applying the same title to high and low alike, or the same term to good and bad alike.”

Burton Watson（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page 87）把這個記錄這樣譯成英文：The marquis of Teng died. Why does it not record his name? Because Teng is a minor state. If it is a minor state, then why does it call him ‘Marquis’? There is no objection to this. In the cases of both noble and lowly the Annals does not object to using the same terminology.

為了確定這「嫌」字的意義，我查了所有出現在《十三經》，《墨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論衡》，《白虎通》和《漢書》的「嫌」字。我檢查的結果讓我確信「嫌」字的意義是：deceptive resemblance giving rise to uncertainty as to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to be so deceptively similar as to give rise to uncertainty with regard to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相似得使人誤解或者嫌疑一件事物的真相）。

這個例子表明你要確定一個字的意義不能盡靠辭典。我自己認為我的文章“On